

一、北京奧運與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

淡江大學趙春山教授主稿

- 中共藉北京奧運形塑新國際形象，透露其統治方式亦是發展路徑的一種選擇。
- 北京奧運順利舉辦，暫時疏緩改革開放衍生問題對中共當局之壓力，並更加確立改革開放之執政路線。
- 北京奧運提供中共調整對外關係的機會，除改善與鄰國關係，亦強化其和平崛起的姿態。

2008年8月8日晚間8時，全球大約40億的觀眾透過電視轉播，觀看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宣布，第29屆奧運在北京揭開序幕。中國人等待這一刻很久了，至少，從北京在2001年7月13日取得主辦奧運權利開始，包括江澤民在內的中共領導階層，即把辦好奧運當成「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工作重點」。江澤民的繼任者順利完成了這項任務，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說：北京奧運已成為奧林匹克運動的里程碑。從數字上看，羅格沒有言過其實，無論是參賽的各國和各地區的運動員，參加開幕式的外國元首政要，以及前往北京採訪的中外記者，人數之多，雖未必會成絕後，但至少堪稱空前。

一般認為，主辦奧運提供中共領導人對外展示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和現代化的機會。就內政而言，中共統治當局可藉此表現共黨的執政能力，以及確定中共與西方並駕齊驅的強權地位。而這些成就，歸根結底，都是拜改革開放之賜。今年是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30周年。不可否認，經濟建設是當初中共決定這項政策的主要動力，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共能夠投下400多億美金打造奧運的各項基礎建設，就足以證明中國大陸已非吳下阿蒙，早就脫離30年前的「一窮二白」。然而，單就「唯物」的觀點評論中共申奧的動機，可能低估了中共領導人旺盛的企圖心。我們必須從經濟以外的面向來看

北京奧運與中共「和平崛起」的關係。

首先，我們認為中共意圖透過北京奧運來塑造新的國際形象，這個形象是用中國文化加以包裝，但卻具備共黨意識形態的內涵，即符合「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標準。經由大導演張藝謀的精心設計，中國 5 千年的歷史文化，在科技的輔助下貫穿於奧運開幕式的每一個節目當中。西方觀察家特別注意到，中共高度的動員能力，以步調一致的「集體」行動來展現其「和諧」的一面。換言之，中共似乎要對觀看開幕儀式的全球民眾傳遞一項訊息：發展不僅可以運用西方或自由主義的途徑達成，也可採取東方或集體主義的方式。我們認為，如果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是要構建一個「和諧社會」或「和諧世界」，則西方觀察家已受到影響，因為他們已經覺得：「一個和諧的集體 (harmonious collective) 理想，也有可能成為美國夢想 (American Dream) 般的吸引力」，這對於堅持專政統治的中共當局而言，無異構成了一個強而有力的鼓舞。

其次，北京奧運的順利舉辦，確立了中國大陸著名學者胡鞍鋼所說：「在中國，開放主義才是主流」。中共推動改革開放已經堂堂進入第 30 個年頭，但這條路走得並不平順。例如：所有中國大陸出現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貪污腐敗嚴重等現象，都被解釋是改革開放的「後遺症」。有識之士都認為這些問題雖有待深化改革開放來解決，可是當胡錦濤在 2005 年準備向改革進行「攻堅」時，該年年底卻出現了「反思改革」的聲浪。反對改革者認為，改革弊端引發的民怨，已超過改革的成果，他們擔心最後會導致政治不安和社會動亂。另一方面，對外開放使西方開始注意到過去那些「看不見的中國」，那些諸如中共違反人權和新聞自由的部分。例如：在中共申奧過程中，有關提高西藏自治權力、中國大陸的政治自由化、加強環境保護，乃至於北京處理蘇丹問題的態度等問題，都讓中共領導人飽受來自外界的巨大壓力；但這些壓力都會因北京奧運的成功而暫時得到紓緩，改革開放也將順水推舟，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最後，我們認為北京奧運提供中共調整對外關係的機會，為了讓

奧運順利舉行，中共曾大幅改善與周邊鄰國的關係，包括馬英九勝選後兩岸關係的改善。紐約時報刊登專文表示，中共改善睦鄰關係不僅可減少別國破壞中國舉辦奧運會的可能性，還有助於展示中國是一股新興的國際力量，在世界舞臺和平崛起，而非靠軍力崛起。

中國大陸學者認為，奧運是中國發展的一個轉折點，中國想透過奧運蛻變成為更成熟的社會，進一步提高國家綜合國力，並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隨著北京奧運的圓滿落幕，外界關切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北京的下一步是什麼？奧運帶給中共極大的際遇，隨之而來的就是一連串的挑战。西藏人民的訴求不會劃上休止符，國外人權團體也不會停止對中共人權紀錄的檢驗。所謂人散曲未終，北京奧運後，中共已無法把這些異議之音，一概視之為一場國際「反華大合唱」！

二、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對話觀察

銘傳大學許志嘉副教授主稿

- 4月25日，中共宣布準備與達賴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
- 5月4日，中藏代表深圳會談，7月初北京第2次會談，無共識、無交集，但已成功減緩支持西藏人士的示威抗爭行動。
- 2002至2007年中藏舉行6次會談，立場不同，也無交集。
- 中藏雙方歧見仍深，尤其是西藏的歷史與人口問題。
- 北京實質有效控制西藏，占有絕對優勢，無對話急迫性。

（一）國際施壓中藏重啟對話

今(2008)年3月14日，西藏爆發警民衝突，中共當局出動武裝部隊進行「鎮壓」(自由時報，2008.3.15，A1版)，透過西方媒體的報導，西藏的衝突引起各界關注。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第一時間就呼籲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話(中央社，2008.3.14)。

西藏事件不僅引起各界關注，從3月24日在希臘點燃奧運聖火儀

式開始，到聖火在世界各地傳遞期間，便不斷出現支持西藏的人士示威抗議與搶奪聖火事件。面對衝突事件的不斷出現，國際社會及各國領袖紛紛呼籲北京與達賴對話以解決問題。

4月25日，中共當局透過新華社新聞稿宣布，考慮到達賴多次提出恢復商談要求，中共中央有關部門準備與達賴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聯合早報，2008.4.26）。釋出願與達賴代表對話消息後，美、英、法、德、日等多國隨即表示歡迎；奧運舉辦前，中共與支持西藏人士的緊張對峙，也隨著北京當局願與西藏流亡政府對話而暫告緩和。

5月4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與藏族的統戰部副部長斯塔代表北京，與達賴的私人代表，西藏流亡政府駐華盛頓代表洛地嘉日、駐日內瓦代表格桑堅讚在深圳舉行為期一天的會談（大紀元，2008.5.5）。這次對話雙方並未達到具體共識，中共代表重申北京對達賴的政策，達賴代表則表達他們對西藏問題的看法，雙方雖無交集，但同意在適當時間繼續對話（BBC中文網，2008.5.5）。

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為了顧及北京奧運的順利進行，中共當局宣布與達賴代表進行對話，這次對話雖未達成任何具體成果，但已經成功減緩支持西藏人士的示威抗爭行動，也讓原本受到國內壓力還在猶豫是否出席北京奧運開幕式的西方國家領袖，取得了出席京奧的合理化依據。

（二）互信不足雙方各有立場

7月1-2日，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在北京進行西藏「314事件」之後的第2次對話，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杜青林會見達賴特使團時，重申北京當局立場，要求達賴明確承諾「四個不支持」的立場，應公開、明確承諾並以實際行動「不支持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不支持策畫煽動暴力犯罪活動，不支持並切實約束藏青會的暴力恐怖活動，不支持一切謀求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的主張和活動」（中時電子報，2008.7.4）。

雖然達賴對於今年舉行的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的第7輪談判寄望頗深，期盼能夠明顯改善雙方討論的情況（中央社，2008.7.2），達賴特使團也

參觀了北京奧運場館，還與藏學專家學者進行座談，但是，此次會談雙方仍無交集。北京宣稱，如果達賴喇嘛方面「確實有積極表現」，年底前可再進行接觸商談（中時電子報，2008.7.4）。

從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今年舉行的第 7 輪談判的 2 次會談來看，雙方的歧見仍然沒有化解。第 2 次會談結束後，西藏流亡政府談判代表洛地嘉日認為，在奧運前北京無意與西藏流亡政府認真談判（大紀元，2008.7.4）。事實上，從 2002 年中共與達賴代表舉行首次會談以來，至 2007 年共舉行 6 次，雙方立場都不同，也沒有什麼交集（中國時報，2008.4.26）。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之間歧見很深，談判也就很難有進展，仍只是停留在見見面及交換意見。

北京與達賴雙方談判進展緩慢最主要的原因是彼此互信不足，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認為，雙方歧見很深，尤其是在西藏的歷史與人口問題方面。流亡政府願意承認西藏「現在」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中共希望達賴承認西藏在歷史上也屬於中國，流亡政府認為這等同於認同中共侵占西藏是合法行為，因此無法同意。在人口方面，流亡政府反對中共將西藏土地劃為 11 個區域，希望整合所有藏區，並獲得完全的自治權力，但北京並不同意（中央社，2008.6.9）。

（三）北京占優勢退讓恐有限

達賴喇嘛曾經多次重申，不尋求西藏獨立，只希望西藏高度自治，但北京一直認定，達賴並未放棄追求西藏獨立。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西藏「314 事件」後還強調，如果達賴放棄獨立主張，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談判大門是敞開的，但「314 事件」「證明」達賴在前兩個關鍵問題上是虛偽的（新華網，2008.3.18）。即使在恢復與西藏流亡政府對話後，中共官方媒體也強調達賴主張西藏獨立。

從雙方會談過程來看，北京願與達賴恢復對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為了辦好奧運，一來，希望以對話換取西藏流亡政府或同情西藏人士停止抗爭；二來是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希望以對話換取國際認同，

減緩國際人權人士的批評，減少國際社會抵制北京奧運的壓力。

在一切為奧運的前提下，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展開對話，但並沒有達成任何具體協議，雙方仍然各有立場，歧見仍深。對北京而言，西藏已經穩定統治，處在絕對優勢的地位，談判沒有迫切的需求，隨著達賴喇嘛的逐步老化，問題便愈容易掌握，達賴回到西藏問題反而更複雜，反倒不利中共對西藏的有效控制，時間對北京是有利的。對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客觀形勢不利，達賴的老化增加了解決問題的急迫性，也減少了談判的籌碼，時間是不利流亡政府的。

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的優劣勢似乎很明顯，對流亡政府而言，最大的助力是來自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但要達到扭轉情勢的地步仍然很遠。年底前可能的復談是觀察雙方互動的重要時機，但處於絕對優勢，且已成功舉行奧運的北京當局並無重啟對話的急迫性，就算對話，會做的讓步恐怕相當有限，流亡政府的底限也很清楚，雙方仍不會有交集，除非其中一方改變重大思維，做出重大的讓步，否則可能仍是各說各話，問題仍將懸而未決。

三、中國大陸股市震盪的因素及影響

政治大學魏艾副教授主稿

- 法制環境的改善和市場機制的改革，帶來中國大陸股市興旺，但是股市仍不成熟，近 10 個月創近年來最大的跌幅。
- 股權分置改革和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是中國大陸股市興旺的主要推動力量，然而對中國大陸經濟前景預期不樂觀、國際經濟景氣不振以及中共當局宏觀調控成效等則是影響股市下滑的重要因素。
- 中國大陸股市盲從、投機和短期逐利性是影響未來中國大陸股市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如何擺脫「政策性依賴」則是股市得以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

2008年，在這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屆滿30年的一年，中國大陸傾全國之力舉辦一次令人驚艷，又獲致相當成果的北京奧運，但是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經濟正經受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對外，受到美國次貸危機蔓延、國際油價高漲、世界經濟放緩、新興市場潛在的國際金融風險加大等因素的衝擊；對內，則受到國內嚴重自然災害、經濟周期出現的變化、通貨膨脹的壓力仍然較大等因素的影響。這一連串無法預見或難以控制的因素，為前兩年狂飆的中國大陸股市帶來沈重的打擊，導致今（2008）年以來股市的重挫。因此，中國大陸宏觀經濟運行究竟出現了何種問題？對中國大陸股市造成何種影響？便成為奧運後海內外關注的重要課題。

（一）股市跌幅創近年來新紀錄

中國大陸股票市場發展的時間並不長，但股市卻經常呈現劇烈的波動。1990年12月19日，中國大陸股市從100點起步，到1992年5月26日止，上海證券指數已躍升至1,429點，隨後迅速暴跌至400點，導致股民損失慘重。進入21世紀後，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中國大陸經濟增長，中國大陸股票市場有較快的發展，使以股票市場為代表的中國大陸資本市場迅速發展。截至2008年6月底，中國大陸A股、B股市場共擁有上市公司1,661家，總市值21.92兆元（人民幣）。按照2007年的GDP核算，證券化比率已達88.89%（金融時報，2008.7.2，版3），投資者的數量與結構均發生了實質的變化。

與其他國家的發展一樣，中國大陸資本市場的發展，主要在於法制環境的改善和市場機制的逐步改革。近年來，中共推行一系列有關加強基礎性制度建設、改善市場質量和結構，以及提高市場效率的重要改革措施，獲得相當的成果。其中，2005年的股權分置改革，更被認為是中國大陸資本市場的重大改造，也帶來中國大陸股市的興旺。

近兩年來中國大陸股市擺脫了前幾年的低迷，出現連續上漲行情，股票指數不斷創出新高，股市市值持續擴增。然而，由於股市仍不成熟，因而也出現一瀉千里的大幅震盪。上海證券指數從2005年6

月 6 日的 998 點，一路上漲至 2007 年 10 月的 6,124 點的高峰，漲幅超過 500%。但是自此之後，A 股連續下跌，僅 10 個月時間跌落至目前的 2,700 點以下，跌幅高達 50%，創 15 年來新的紀錄。根據中國大陸方面的統計，A 股市場共有 617 支個股被腰斬，跌幅超過 4 成的個股多達 1,038 支；在 1,500 支有交易記錄的 A 股中，只有 78 支個股累計上漲（金融時報，2008.7.8，版 7）。股市的劇烈波動給廣大的投資者帶來極大的困惑，並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前景產生懷疑。

（二）股權分置改革有助於股市興旺

在市場經濟中，必然會出現經濟的周期變動，股票市場既然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晴雨表，自然會受到經濟周期的影響。然而，股票市場與一般商品市場主要依供求關係來決定的情況不同，它有其特殊性。股票價格不僅取決於公司的經營狀況，同時也受利率、匯率、通貨膨脹、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重大自然災害，以及投資者心理預期的影響而發生波動。

2006 年以來中國大陸股市的快速發展，主要是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持續而穩定的成長，以及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和資本市場法律體系逐步完善所帶來的結果。2006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修訂的「公司法」和「證券法」，以及相關配套的法律法規的完善，確立了資本市場的法律關係和運行機制，對中國大陸資本市場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2005 年 5 月開始實施的股權分置改革，使中國大陸資本市場有了明確的制度規範。此一制度性的改革，大股東的利益與小股東的利益趨於一致，很多大股東將優質資產注入上市公司，改善了上市公司的質量。

中國大陸是實行股權分置的雙軌制資本市場，亦即一部份存量的國有股暫不上市流通，增量部份則股份化後面向公眾發售。隨著股市的發展，其無法流通的弊端逐步凸顯出來。為解決上市公司的一部份股份上市流通，另一部份暫不上市流通的狀態，2005 年 4 月底，中共推行了股權分置改革。基於緩衝非流通股上市壓力的考量，改革之初

確定了非流通股在股改後第一年不上市，隨後二年按比例上市的原則。如此，很多上市公司在股改後便可逐步上市，從而陸續進入全面流通狀態（人民日報，2008.6.24，版10）。

股權分置改革改變了上市公司大股東的利益取向，使其更加關注股票在市場上的表現，並提高了股市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由於股權分置改革，才使得股市擺脫了之前長達4年的低迷，出現了兩年的上升行情。

除此之外，人民幣匯率持續不斷升值也是推動股市上漲的重要因素。2001年以來美元持續貶值，人民幣持續升值，尤其是2005年7月21日中國大陸開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快速升值，迄今升值幅度達21%（經濟參考報，2008.7.22，版1），國際資本透過各種管道大量進入中國大陸，加劇中國大陸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過剩，推動了股市行情不斷上漲。

（三）股市大幅下跌的主要因素及其影響

2007年年底以來，中國大陸股市出現了大幅下滑的波動，主要原因為：

第一，前期股市急劇上漲，但也累積了風險意識，亦即股票價格已大大超過其內在價值，再加上投資者對於奧運之後中國大陸經濟的前景有所疑慮，而作出調整。

第二，受到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和國際經濟景氣不振的衝擊，2007年第4季之後，美國次級房貸危機愈演愈烈，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強烈的衝擊。與此同時，整個國際經濟等諸多不確定因素，包括石油和鐵礦石價格高漲、新興市場潛在的金融風險等，導致全球股市表現不佳。今（2008）年下半年國際經濟景氣並不樂觀，也影響對中國大陸股市發展前景的預期。

第三，中國大陸宏觀調控的成效。近年來，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中共採取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包括多次調高存款準備率、降低出口退稅、擴

大限制類出口產品類別、加強對土地和房地產信貸管控，緩解了流動性過剩的壓力，使股市供求關係略微趨於均衡。此外，今（2008）年年初的冰雪災害及 5 月四川汶川大地震，也加劇投資者的恐慌心理，影響投資意願。在沒有增量資金入場的情況下，自然無法拉擡下滑的股市。

股市的大幅波動給中國大陸經濟社會帶來嚴重的危害和風險。股市的持續飆漲將吸引更多人投身股市，造成所得重分配的效果，而股市過度膨脹，近而形成泡沫，在泡沫膨脹到一定程度而破滅時，將使投資人財富大幅縮水、資產大幅貶值、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甚至造成社會不安的現象。

然而，股市的劇烈波動，短期間內值得關注的是熱錢的流進和流出。根據中國大陸方面的統計，2003 年到 2004 年年底，國外熱錢累計進入中國大陸大約 1,519 億美元（經濟參考報，2008.6.16，版 10），這是助長近年來中國大陸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在股市大幅下滑，而人民幣預期升幅空間變小的情況下，熱錢可能大量流出，對中國大陸經濟乃至於亞太經濟的衝擊，極應密切加以注意。

（四）未來中國大陸股市發展的限制

相較於西方先進國家的股市而論，A 股市場的發展歷史只有 18 年的中國大陸股市，投機風盛、基礎制度不健全、風險對沖機制不完善、機構投資者發展不充分和投資理念不成熟等新興市場的特徵非常明顯。在此種情況下，大起大落幾乎是中國大陸股市的主要特徵。換言之，中國大陸股市的參與主體明顯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盲從、投機和短期逐利性。一些上市公司急功近利拉升股價，有的甚至透支業績；不少投資者不是根據對公司績效的考量來決定自己的投資行為，而是更多地依賴行情的波動而隨波逐流，也因此必須承擔更大的風險（金融時報，2008.7.2，版 3）。

近年來中共積極致力於股市市場化改革，一系列旨在為投資者創造良好、公平市場環境的法律法規體系陸續推出，以期提高市場效率。但是中國大陸股市最大的問題在於政策依賴性太高，也就是股市被稱

為「政策市」，明言之，中國大陸股市發展的走勢圖，其起伏的曲線，很大程度是受「政策」的影響。

以最近中國大陸股市大幅下滑時，中共官方媒體便不斷發出政策號召，今(2008)年7月初，新華社連續發表「關於中國股市的通信」、「7月中級反彈可期」的文章，而中國證券報、金融時報也分別發表題為「股市穩定健康關乎經濟全局」、「理性看待當前中國股市調整」的文章，這種「政策性」號召便是行政手段，這隻「看得見的手」無所不在地揮動著，因此如何擺脫政策性依賴才是中國大陸股市得以健康發展的關鍵。

四、中國大陸確保糧食安全與糧價穩定的課題與措施

中興大學黃炳文副教授主稿

- 中共當局 2008 年擴增農業預算，並提高稻穀及小麥的最低收購價，預期可實現連續第 5 年增產的目標，糧食產量將超過 10,000 億斤(5 億噸)。然其糧食生產仍面臨品種與區域供需不均的結構性課題，以及運輸與倉儲的運銷性課題。
- 糧食價格在 2007-2008 年呈現持續上漲的現象，因此推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同時食品價格在 2008 年 1-6 月的漲幅在 20% 上下波動。然而與國際糧價及農業資材價格漲幅相比，仍存在低糧價的課題。
- 2008 年 7 月 2 日中共國務院通過「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提出糧食自給率穩定在 95% 以上，確保 18 億畝(1.2 億公頃)的耕地，糧食產量維持在 1 萬億斤以上，至 2020 年達到 10,800 億斤以上。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共產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2007年10月16日)'

曾明確報告：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根據新華網的報導，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今年4月5、6日視察河北春耕生產情形時，指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依靠自己解決吃飯問題，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溫家寶亦強調糧食生產對抑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性。此間反應出在面對國際「糧荒」的壓力下，中共當局對於糧食安全及糧價穩定的高度重視。

（一）近10年（1998-2007）中國大陸糧食生產的轉變

中國大陸的糧食產量，在1998年曾達到最高峯10,246億斤，當時中共當局研判糧食供需已達平衡，且可能有過剩問題，因此就相關的糧食政策作調整（新華每日電訊，2008.5.5）。由於中國大陸的低糧價政策及工商業的快速發展，農民的種糧意願大受影響，以致糧食產量成長呈停滯，甚至在2003年降至8,613億斤（市斤，每市斤合500公克）的低水平。為改善此糧食生產情勢及提高農民種糧意願，自2004年起從糧食風險金提撥經費直接補貼給農民（新華網，2008.6.19），2005年開始實施最低收購價政策（中共中央電視臺，2008.7.22），2006年起取消農業稅賦，並相繼推動農資綜合直補等政策（中華合作時報，2008.4.25）。此等措施明確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方針（新華網，2008.6.19），對激勵農民的種糧意願有明顯效果，自2004年至2007年的4年間，糧食總產量持續增長，2007年糧食總產量高達10,030億斤。在2007年開始呈現的國際「糧荒」情勢下，確實有助於確保中國大陸的糧食自給程度。

（二）2008年鼓勵糧食增產的措施

儘管中國大陸的糧食生產已連續4年豐收，但與10,200億斤的糧食消費量相比，基本上實現「緊張的平衡」（中國糧油資訊網，2008.7.18）。2007年底中共當局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一再強調：「糧食安全的緊鐘要始終長鳴」（人民日報，2008.4.14）。在此糧食仍呈緊張的情況下，加上國際「糧荒」的壓力，中共當局在2008年更加強對糧食生產的支持程度。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3月27日召開的全國農業和糧食生產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表示，2008年的「三農」預算投入5,625億元(人民幣，以下同)，除比2007年增加1,307億元，另增加252.5億元投入，主要直接補助給農民，並採取10項重要措施，支持農業及糧食生產。其中直接提高生產誘因者主要有：1.再增加156億元農資綜合直補，使每畝糧食種植面積的農資綜合補貼比上年增加23元，達到40元。2.再增加50億元良種補貼，擴大補貼範圍，對4.4億畝水稻全部實行良種補貼，小麥良種補貼面積由1億畝增加到2億畝，玉米良種補貼面積由3,000萬畝增加到2億畝。3.近一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例如每斤稻穀最低收購價比上年提高7分錢，每斤白小麥最低收購價比上年提高5分錢。

再者，稻穀最低收購價執行範圍除既有7省(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外，再擴加4省(區)(遼寧、江蘇、河南、廣西)，並鼓勵南方的稻農由單期作改為兩期作，即「單改雙」(光明日報，2008.5.18)。

由此可觀知，中共當局為鼓勵糧食增產，在「廣度」及「深度」方面，採取更積極的作為。其中「廣度」即增加收購地區範圍及期作數，「深度」即提供更多的補貼及更高的收購價，如此不僅提高種糧意願，亦提高糧食增產的空間，因此預期2008年將實現連續第5年增產的目標。

(三) 糧食安全的結構性與運銷性課題

儘管糧食生產總量與消費量的數字，表面上可謂幾近「平衡」。但究其內涵，由於中國大陸的糧食種類多樣化及幅員廣潤，在「糧食平衡」的背後，基本上隱含有結構性及運銷性的課題。

在結構性課題方面，中共國家糧食局局長聶振邦指出(人民日報，2008.4.14)：在品種結構上，小麥由產不足需轉變為產略大於需，稻穀由產不足需轉變為產需基本平衡，玉米由供需平衡有餘轉變為基本平衡，大豆的產需缺口擴大而有賴進口。在區域布局上，13個主產區(河北、河南、黑龍江、吉林、遼寧、湖北、湖南、江蘇、江西、內蒙古、山東、四川、安徽)的餘糧較多，7個主銷區(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北京、天津、上海)糧食自給率下降，11個產銷平衡區的

糧食缺口有所擴大。基此，可探知中國大陸的小麥、玉米、稻穀大致能自給，甚至可供出口，根據中國國家糧油信息中心主任尚強民表示 2007 年小麥淨出口 300 萬噸、稻穀淨出口 130 萬噸、玉米淨出口 487 萬噸；而大豆則須大幅依賴進口（根據估計，中國大陸每年大豆消費量約 4,500 萬噸，其中 3,000 萬噸為進口）。再者，區域間的糧食產銷失衡，進而衍生運銷性的課題。

運銷性的課題主要可區分為運輸與倉儲兩方面。在運輸方面，受限於交通運輸設備與容量等之限制，有些主產區的糧食未能及時運至主銷區，以致主產區的糧價受挫，糧農收益受影響，例如根據中共中央電視臺（2008.4.30）的報導，黑龍江的稻米因交通運輸的瓶頸，使得諸多稻米堆在火車站等待運送；另外，主銷區可能因主產區糧食調配不及而需進口，例如根據新華每日電訊（2008.5.5）的報導，廣東省糧食年缺口量達 2,400 萬噸，除由湖南等主產區調配外，亦由東協國家進口糧食。在倉儲方面，有些主產區為因應收穫季節，亟需優質倉儲設備與容量，以確保糧食的儲存品質；有些主產區藉機擴大糧庫，期能於青黃不接時期賣得好糧價；因此有些主銷區的糧食倉儲量可能出現不足的窘境，此由「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指陳有人向其反映國家庫存有虛報的現象（新華每日電訊，2008.5.5），有關糧食倉儲的課題引起各界的關注。

（四）糧價續漲但仍存在低糧價的課題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 2007-2008 年全國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2008 年第 1 季全國農產品生產價格較 2007 年同期上漲 25.5%，其中糧食上漲 11.4%。而糧食中，小麥、稻穀、玉米、大豆分別上漲 8.7%、3.5%、8.9%及 40.1%，由此顯示大豆因仰賴進口而受國際大豆價格上漲的影響大。再者，2007 年第 1 季至第 4 季的上漲幅度分別為 7.3%、7.6%、8.0%、13.3%，可觀知糧食價格呈現持續上漲的現象，尤其是大豆價格的漲幅有擴大的情形，例如由 2007 年第 1 季的 3.2%增至 2008 年第 1 季的 40.1%。

隨著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亦受影響。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08 年 1-6 月的商品零售價格上漲幅度大致在 6

%-8%，然其中與糧食有關的食品分類價格漲幅在 1 月份為 18.3%，2-4 月份則超過 20%，5、6 月則略降，在 6 月份為 17.2%。由此可知食品價格高幅上漲影響整體物價的上漲。為抑制通貨膨脹，對糧食價格上漲幅度的調控是有必要的，因此亦衍生低糧價的課題。

低糧價的課題可區分為相對於國際穀價及農業生產投入價格的漲幅，其主要顯現於稻穀與小麥。在相對國際穀價方面，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 (FAO) 的資料，5 月份每公噸稻米及小麥的價格為 870 美元及 358 美元，若以 1 美元兌換 6.8 元人民幣計算，折合每公斤稻米及小麥的價格約為 5.9 元及 2.4 元人民幣，由此對照前述粳稻、白小麥的每公斤最低收購價格分別為 1.64 元及 1.54 元，很明顯低於國際價格甚多，難怪乎儘管目前中共當局採行糧食出口管理（如徵收暫定關稅、出口配額許可管理），稻米的出口依然暢旺，根據金融時報 (2008.4.19) 的報導，今年第 1 季的稻米出口較去年同期增加 39.4%。

在相對農業生產投入價格方面，雖然 2008 年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格漲幅約 7-10%，但農業生產投入的價格漲幅更高，根據中國青年報 (2008.5.5) 的報導：2007 年的農業生產資材價格上漲 7.7%，2008 年 1-2 月上漲 15.4%，4 月份的化肥漲幅 70%-80%，農用柴油及農藥等價格漲幅均大於糧食價格的漲幅。再者，人工費用亦大幅上漲，因此收購價格上漲未能反應真正生產成本的上漲，此將影響農民的種糧意願，進而影響糧食的生產。為因應此課題，中共當局亟需積極改善糧食收購、倉儲及運銷工作，以免主產區的糧價過度偏低；再者，為提振農民種糧意願，又不想過度拉擡糧價，中共當局勢必藉助更多的補貼措施。

（五）國家糧食安全的中長期規劃

根據新華社 (2008.7.3) 的報導：7 月 2 日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其目標為糧食自給率穩定在 95% 以上，2010 年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穩定在 1 萬億斤以上，2020 年達到 10,800 億斤以上。為達成上述目標，其主要內容有 9 項：1. 堅持家庭承包經營

責任制長期穩定不變，推進農業經營體制機制的創新；2.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保護耕地，不能有絲毫鬆懈，全國耕地保有量不低於 18 億畝，基本農田不低於 15.6 億畝；3.下大力氣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農田水利建設，穩步提高耕地基礎地力和產出能力；4.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國家財政支出重點向農村傾斜，逐步理順糧食價格，逐年較大幅度增加對農民的種糧補貼；5.強化科技支撐，大力推進農業關鍵技術研究，著力提高糧食單產，力爭有大的突破；6.繼續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健全糧食市場體系，加強糧食物流體系建設；7.完善糧食儲備體系，優化儲備布局和品種結構，健全儲備糧調控機制；8.健全農業服務體系，加大金融對農村、農業的支持力度；9.引導科學、節約用糧，在全社會形成愛惜糧食、反對浪費的良好風尚。

上述的規劃綱要涵括生產、運銷、服務、消費等 4 個層面，其中生產又包括農業經營體制、農地、水利、農民、科技等主軸，運銷兼顧糧食流通與儲備主軸。綜合觀之，此綱要的範圍涵蓋整個糧食產業鏈，對於達成糧食自給率 95% 的目標，具有正面且可行的指導作用。關於此綱要隱含若干背景，在此作一簡要解析。

1.創新農業經營制度：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雖對鼓勵糧食生產有積極作用，但由於中國大陸人口眾多，以致平均每人耕地面積約僅 1.38 畝或不足 0.1 公頃（每 15 畝折算 1 公頃），或依中國大陸統計年鑑資料，農村每人的耕地面積約 2.11 畝，如此狹小的面積實不利於提高經營效率，因此確有必要創新農業經營制度，藉由產銷合作組織的推動，期能發揮規模經濟。

2.確保基本耕地數量：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非農業用地需求逐增，以致農業用地漸減，然為糧食供應安全，確保基本耕地數量是必要的，依 18 億畝（1.2 億公頃）的耕地欲由現行生產 1 萬億斤（5 億噸）的糧食，至 2020 年增產為 10,800 億斤（5.4 億噸），平均每公頃需增產 333 公斤，除制度面改革的激勵外，仍須藉助農業科技的大力支持，方有助於達成目標。換言之，耕地若不能確保基本數量，欲達成糧食生產目標可能轉為艱難。

3.提高農民所得：農民的種糧意願影響糧食生產至鉅，然由於採取低糧價策略及經營規模狹小，農民所得相對偏低，為顧及糧食供應安全及社會安全，關於農民的福利及種糧補貼確有需要再擴大幅度；再者，藉由最低收購價的提高及糧食流通與倉儲體系的改善，將有助於穩定糧價，進而提高農民所得。

4.珍惜食物：中國大陸隨著國民所得逐漸提高，社會大眾對食物的消費能力增強，尤其對蛋白質（如肉類、蛋類、乳品）的需求增加，延伸對飼料穀物需求增加，尤其是玉米，根據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中心黃秀琨的估算，中國大陸將由玉米淨出口轉為需依賴進口。因此若能在健康的原則下，適量消費食物，甚至減少浪費食物，試想若能減量消費糧食1%，約可減少100億斤的消費量，此恰等於7月2日與上述綱要一起通過的「吉林省增產百億斤商品糧能力建設總體規劃」之糧食數量。所以推動愛惜糧食之風尚，將有助於降低中國大陸糧食生產的壓力。